

# 音像志初探

## ——兼评三个相关课题

鲍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1)

**[摘要]** 音像技术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出现于20世纪。音像志是音像与志的结合,是一种基于音像的学术表达体裁,注重纪实,注重内容完备。理论上任何一门类的志都可能发展形成它的音像志,诸如地方音像志、人物音像志等。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家在这个领域开展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中国节日影像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等大规模课题研究。从音像志的角度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将它归入民族音像志并定位为民族音像志在中国的开创性起点是适当的,但民族音像志要成立、民族概念要音像化,需要找到适当的转换方法,即需要找到一个满足两方面要求的对象,一方面,这个对象是可音像化的;另一方面,这个对象与民族概念关系要紧密。民族音像志的目光应落实到民族概念所内含的最基本最具体的存在层面上来,即锁定于具体的人。如是,民族音像志的学理逻辑也就出来了,即把一个人拍清楚了,他或她所承载的民族共性也就在其中了。民族音像志的存在意义就是通过对民族人物的音像呈现以增进不同民族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在《中国节日影像志》的制作过程中,借助抽象概念对节日进行学理分析是节日音像志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必须从音像的本质出发来探索呈现节日的具体途径,这就要求对第一步所涉及的所有抽象概念进行现象学悬搁,节日活动适合音像化的对象是过节日的人;第三步,解除现象学悬搁,返回第一步,即在把节日人物作为音像化的对象的前提下,探索体现节日学理分析结果的具体途径。从音像志视角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已初步构造了非遗传承人音像志的框架,但仍有待更为完善。笔者在丰厚的实践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接续本土“志”学传统,并借鉴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思想,试图勾勒出一一种“音像志”的理论走势,以期助益于拓展以音像为本体的学术研究表达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 影像学; 民族; 非遗; 节日; 现象学悬搁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20) 01-0062-08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0.01.007

志是一种基于文字的传统文本体裁,注重纪实,注重内容完备,有方志、人物志、寺观志、山志等,类别诸多。音像志是音像与志的结合,是一种基于音像的新兴文本体裁,亦注重纪实,注重内容完备。理论上任何一门类的志都可能发展形成它的音像志,诸如地方音像志、人物音像

志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秉承国家建设重修志的传统,开展了四个与音像志相关的国家重大课题,它们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下文简称为民纪片)、《中国节日影像志》(下文简称为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影像志》(下文简称为史诗影像志)和《国家级非物

**[收稿日期]** 2019-06-18

**[作者简介]** 鲍江(1968—),男(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创新工程课题《人类学基础研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资助成果,特此致谢。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下文简称为非遗记录)。目前,民纪片已完成,节日影像志和非遗记录已完成部分,史诗影像志正在进行中,尚未形成一定的成果规模。

本文在此先提出影像志理论建构的几个基本问题,然后从这几个问题视角出发,分别对民纪片、节日影像志和非遗记录的相关成果做一个批评性综述。

## 一、影像志的定义

志是一种共时性文体,与历时性文体“史”相对,史与志是中国传统学术两大文体。影像志是影像与志的结合,是一种以影像为本体的共时性学术影片类型,注重纪实,注重内容完备。理论上,任何门类的志都可能发展形成它的影像志。

影像志是摄录机介入并促成的一个特殊场域,它以共时性专题学术影片的生产与使用为目的,体现为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影像记录与呈现是客观的,它依赖于视听实存对象;另一方面,相关主体的生活世界在此相遇、交集。

志与影像志的联系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共时性。其二,纪实。其三,主题化。其四,内容完备。志与影像志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本体区别,志以文字为本体,影像志以影像为本体;文字有概括性,影像有具体性。其二,主题实现途径有区别,志和影像志的生产流程包括概念体例设计、内容充实两个环节,但影像志的生产流程多一个中间环节,即概念体例的影像转换设计。

影像志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完备影像文化生态体系。自19世纪末影像技术问世以来,作为商业的影像制作和作为政治宣传的影像节目都有较大发展,唯独作为学术的影像作品发展滞后,影像志的提出指向充实学术影像的制作。其二,影像志具备志所具备的一切功能,诸如辅治、保存史料等。

## 二、具体人物才是影像志概念体例的影像转换途径

影像志以影像为本体,适合以具体人物为对象,与以文字为本体的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字是概念的化身,文字为本体的志适合以概念为对象。

以清代张茂节修、李开泰等撰的《大兴县志》为例。全书体例为六纲三十二目。六纲为舆地、营建、食货、政事、人物、艺文。舆地目六:分野考、沿革考、形胜考(附疆域)、山川考、风俗考、古迹考。营建目八:城池考、坛遗考、学校考、公署考、里社考(附坊市)、邮舍考、寺观考、津梁考。食货目五:户口考、徭役考、田赋考、经费考、物产考。政事目三:名宦考、官职考、武备考。人物目七:乡贤考、人才考、节义考、科目考、隐逸考、侨寓考、仙释考。艺文目二:文集考、诗集考<sup>①</sup>。

假设我们修《大兴县影像志》,沿袭此《大兴县志》六纲三十二目的体例亦无不可,但作为影像志体例设计不可或缺的工作环节,我们必须就三十二目的目名概念逐一提出影像转换方案,这将涉及不同的目名概念,影像转换方案会有所差异,但它们有一个相通之处,即都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来承载相关概念的影像叙述。譬如学校考,一种可能的影像转换方案是,以学校为单位,具体可转换为相关角色,譬如分为管理者、教师、学生等三种角色,每种角色选一个人作为影像叙述主角,由三部角色人物影片构成一部学校影像志。

## 三、影像志、主观性与生活世界

影像志体现双重主观性,即影像志作者主观性和影像志主角主观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选择何人何事作为影像志的主角,体现影像志作者的主观性,首先考验的是影像志作者的见识。选定影像志的主角之后,即影像志作者与影像志主角开始往来互动,其中有摄录机介入并促成一

<sup>①</sup> 冯秉文主编《北京方志概述》,第39、40页,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1985。

个特殊的社会场域。此社会场域的本质是探索、发现与创造。它一方面嵌于音像志作者和音像志主角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为音像志作者和音像志主角发挥能动性改变各自的生活世界提供一个特殊的契机。

音像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特殊类型。生活世界的时间性体现为主观性积淀与具体场景的化合反应，此化合反应结果又成为主观性积淀的内容，如此不断反复充实生活世界。一般来说，生活世界的时间性是事后反思方得以呈现的，体现为日记、回忆录、自传等形式。音像生活世界的特殊性，恰恰体现在它的时间性不仅积淀于主观性之中，而且是被摄录机记录在案的。

生活世界是场景化的，这决定了音像场景是音像志最适当的基本单位。音像场景的累积，能够最大化地再现生活世界的时间性，并使音像志的接受者获得身临其境的感知效果，由此与音像志主角和音像志作者在主观性层面生发共鸣。每一音像场景，都涉及时间、空间、人物、行为、对话等五大要件。音像志主角贯穿诸音像场景，每一音像场景的内容又各为一体。如是构成音像志内容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 四、音像志与同期声影像

音像志的基础是关于人和事的同期声影像。音像志的主角是具体人物，而人的存在是形象与声音的统一体，这决定了音像志的基础是关于人和事的同期声影像。从技术史的角度看，录音与录像呈现出从各自独立发展到合而为一的轨迹。早期的录音采用磁技术，早期的录像采用玻璃片和胶片感光技术，到20世纪末期，随着数字技术兴起，录音与录像进入合二为一的新阶段，摄录一体机成为最普遍的音像工具。可以说，到了数字音像时代，录音录像技术和非线性编辑技术为音像志提供了充分的工具准备。

在同期声影像前提下，音像场景制作面临一个技术性挑战。这个挑战涉及两个方面，即非连续影像的可接受性与非连续声音的不可接受性。前者涉及视觉器官的功能特征，即眼睛具有开合功能；后者涉及听觉器官的功能特征，即耳朵不具备闭合功能。影像再现一个场景，比较自由，可以通过多机位多景别的诸多影像片断（即木

语所谓“镜头”）的累积来获得充分实现。声音再现一个场景则比较被动，一方面生活世界的声音通常是多声源多维度的，它们的纪录再现几无断了再在所有维度上平滑接上的自由；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的声音通常有对话的交织，你一言我一语，有其内在逻辑，它的纪录再现也几无断了再平滑接上的自由。如何处理影像与声音的这种本质矛盾，是音像志面临的一个大挑战。

为应对此挑战，音像志作者可参考纪录片学术史的相关成就。在纪录片学术史上，直接电影与解说电影分处此矛盾解决之道的两个极端，前者牺牲影像就声音，注重生活世界影像同期声的连续记录与再现；后者牺牲同期声就影像并引入画外音，注重发挥画外音连贯影像和叙事的功能。其他纪录片类型则根据音像场景的内容，灵活处理影像与声音的关系，选择某些音像场景偏重影像，某些音像场景则偏重影像同期声。

#### 五、民纪录片与民族音像志

民纪录片课题<sup>①</sup>始于1957年，止于1981年，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该课题由国务院民族委员会发起，中央财政专款支持，民族研究机构和电影制片厂合作展开。该课题一共完成21部影片。

追溯该课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重史志的本土文化传统，通俗说法是为了子孙后代。具体原因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语境，即国家最高决策层在社会进化论思想框架中，试图在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展开全面深入的社会制度变革的窗口时间，通过科学与电影的结合，保存一份变革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态的音像纪录。这里的科学，特指受苏联民族学深刻影响的社会进化论思想。

追溯学术史，学界视这21部民纪录片为音像志中以民族概念专指的学术领域——民族音像志中（亦称作影像民族志、音像民族志、民族志电影、人类学电影等）的经典民纪录片，引起了诸多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反思与对话。郭净撰文从中国电影史角度，将民纪录片的学术渊源追溯到民国时期相关的电影实践<sup>[1]</sup>。鲍江《你我田野：倾听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sup>[2]</sup>从现象学视

<sup>①</sup>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简称“民纪录片”。

角，以两部纳西族主题民纪录片为案例，通过与导演、摄影师及参与影片制作的民族学家的访谈对话，澄清民纪录片制作过程中影片作者与影片中人相处之道的具体事实，即此具体事实的核心是你我关系，而非社会进化论所预设的他者与自我关系。这一点在郭净等编著的《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sup>[3]</sup>中亦有体现。今天的人观阅民纪录片，画外音解说词的社会进化论叙事模式会让人感觉荒唐，但是关闭声音，静静欣赏流动的影像，我们能感觉到影片作者与影片中人你我相处之道的温暖。

从音像志的角度看，将民纪录片归入民族音像志，并定位为民族音像志在中国的开创性起点是适当的。也正是在这个开创性起点上，适合提出来讨论的根本问题是，“民族”这个概念是否可以音像化？如果可以音像化，它的音像化途径如何？不言而喻，“民族”不是某个具体事物的名称，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存在于人的脑海中，不直观可感，所以超出摄录机的能力，不可拍。在这个基本面上，“民族”概念不可能音像化，民族音像志的说法不成立。反过来说，民族音像志要成立，“民族”概念要音像化，不可能直来直去，而是需要找到适当的转换方法，即需要找到一个满足两方面要求的对象，一方面，这个对象是可音像化的；另一方面，这个对象与民族概念关系紧密。

民纪录片的相关探索有几种思路。其一，以族名命名影片。其二，以地名限定族名，譬如《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等片名，分别以清水江流域限定苗族、以西双版纳限定傣族、以丽江限定纳西族。其三，以专题名限定族名，譬如上文三部片名，分别以婚姻限定苗族、以农奴制限定傣族、以文化艺术限定纳西族。其四，依赖解说词。

这些解决方案都起到一定的具体化效果，但并不彻底。就地名限定方案而言，地名是具体的，用一个具体概念限定一个抽象概念，结果是一个具体的合成概念，逻辑上成立。困难在于，什么样的一个地名范围合适？这不容易说清楚。譬如，这里的清水江流域苗族、西双版纳傣族、丽江纳西族，所指都是只有在地图上或高空航拍

时才可能收入摄录机镜头的范围，拍不成名副其实的影片。至于专题名限定族名，属抽象概念限定抽象概念，结果还是一个合成的抽象概念，这不可拍。

影像内容方面，大部分民纪录片是碎片化的。抛开声音单看影像，大部分片子是一堆线性铺陈开来的、零零碎碎的镜头，缺乏将它们连贯为一体的视觉元素。其中相对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杨光海导演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大部分场景都涉及同一家人，影像内容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总而言之，民纪录片未找到有效地将民族概念音像化的转换方法。相关探索的总体效果是影片内容两张皮：片名及解说词一张皮，影像一张皮。影片的知识呈现主要依赖于片名及解说词，而片名及解说词的知识源头为民族志研究的文字成果，这导致影片自身的知识边界模糊，缺乏作为一类独立学术成果的充分依据。

民族概念音像化的转换方法何在？实际上，这方法远不在天边，近就在影片作者前，就在摄录机镜头和话筒前。理论上讲，所谓民族性、民族特征，乃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族的共性，任何相关文字描述都是“概括”出来的结果。寻找民族概念音像化的对象时，需要悬搁这些不可拍的抽象概念，穿过抽象概念的迷雾，将对象化的目光落实到民族概念所内含的最基本最具体的存在层面上来，即锁定于具体的人。如是，民族音像志的学理逻辑也就呈现出来了，即把一个人拍清楚了，他或她所承载的民族共性也就在其中了。民族音像志的存在意义就是通过对各民族人物的音像呈现以增进不同民族人与人之间的认识。

上述民族音像志理论洞察，开学科思想先河。不过，此理论洞察并非无前人实践，相反体现在前人诸多相关作品中，甚至早在20世纪初即为这门学问的先行者弗拉哈迪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sup>①</sup>所预言。遗憾的是，学界深受文字人类学、文字民族学学术史里积淀下来的庞大的抽象术语概念库里的思想所束缚，之前一直未能从学理上对“何为民族音像志的对象”这一学科基本问题做过如此彻底、通透的澄清。

<sup>①</sup> Robert Flaherty: *Nanook of the North*. 1922.

民纪录片不呈现人，而去呈现抽象概念。这一点是这批民族音像志经典最大的遗憾。

民纪录片时期，中国尚未有影像同期声录音技术。民纪录片制作中，影像与声音分开录制，到剪辑台上再合为一体。录像使用16毫米黑白胶片摄影机，录音使用盘式录音机。声音包括两部分，一是画外音解说词，一是画外音配乐，影像中的人几乎不发声。解说词由导演撰稿，由专业解说员解说。有的民纪录片所用配乐，采用在拍摄地录制的当地音乐。如《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采用了丽江本地音乐人演奏的乐曲作为背景音乐贯穿整部影片，被音乐人类学界追溯为学科经典。

## 六、节日影像志与节日音像志

节日影像志课题始于2010年，迄于2017年11月，130个子课题立项，47项结项，完成50000分钟音像素材。该课题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下文简称文艺中心）规划实施，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旨在通过影视技术手段记录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节日，以客观反映节日现状为特征，是中国国内第一次进行的系统拍摄记录传统节日的重要研究工作。

文艺中心组织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设计总体规划，然后按总体规划以子课题形式向学界公开招标，由投标并中标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学者负责实施。子课题的竞标评审和结项评审，由文艺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实施。

据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下文简称社科院影视室）学者陈景源、庞涛参与了该课题的总体规划，相关成果体现为《中国节日影像志体例》（下文简称《体例》）。社科院影视室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电影摄制组，1977年由著名民纪录片导演杨光海先生主持创建。

节日影像志在诸多方面继承了民纪录片的学术传统。其一，影片为目标成果。其二，纪录片指向。其三，整体观。其四，拍摄制作以长期田野工作为基础。

当然，节日影像志在影片形态和内容方面的

探索对民纪录片有诸多突破。其一，摒弃“解说词加影像”的叙事形式，保留影像同期声。其二，“以小见大”的叙事形式逐渐获得确立，以一个社区、一家人，甚至是一个人为核心展开节日叙事。其三，关注节日景观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其四，《体例》切入节日的分析视角相当丰富，堪称全面。但美中不足的是，该文本未能弥补民纪录片的遗憾，即缺乏对抽象概念与音像之间关系的深入、彻底的思考。写节日与拍节日，二者相差只一个字，却有天渊之别。前者的本质是思，可以天马行空任我行；后者的本质是影，不仅不可以天马行空，还必须依赖于形象与声音的实存<sup>①</sup>。

从音像志视角看，借助抽象概念对节日进行学理分析是节日音像志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必须从音像的本质出发来探索呈现节日的具体途径，这就要求对第一步所涉及的所有抽象概念进行现象学悬搁，以便直观节日活动，并发现其中适合音像化的对象。不言而喻，节日活动是人的活动，节日活动适合音像化的对象是过节日的人。第三步，解除现象学悬搁，返回第一步，即在过节人物作为音像化对象的前提下，探索体现节日学理分析结果的具体途径。《体例》强调的方面诸多，这里以其中的“重要事项”举其一隅。它包括八个子目，即祭祀/仪式、表演艺术、游戏竞技、服饰、饮食、手工艺品、社交礼仪、亲属关系等<sup>[4]</sup>。假设我们按这八个子目修节日音像志，一部片子的体量显然不充分。比较充分的方案是，每个子目锁定一个人物，以他或她为影片主角，通过他或她来重点呈现节日这个维度。如是，节日音像志就是由八部聚焦不同节日人物的影片构成的整体。

节日是研究微型社区社会文化的一个理想切入点。文艺中心的节日影像志课题，对中国节日影像志领域和节日音像志领域的破题意义重大，并且还拓展出专题音像志体系建构的未来视阈。

## 七、非遗记录与非遗音像志

非遗记录项目始于2013年，由文化部非遗司主持，中央财政专款支持，非遗司委托国家图

<sup>①</sup> 按康德一路的学术，思与实存的关系是“理性为自然立法”，相当霸道。在此道中，依存于自然的东西，其理性自不纯粹，不算地道学术。

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下文简称为国图）进行项目管理。

项目主旨是将传承人对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与自身掌握的精湛技艺通过数字化多媒体手段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下来，保留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为后人传承、研究、宣传、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宝贵资料，这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形态上，非遗记录项目与节日影像志课题有同有异。共同点是总体规划和成果评审依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非遗记录子项目招标由各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节日影像志子课题招标由文艺中心负责。其二，非遗记录子项目招标面向社会市场主体，节日影像志子课题招标面向高校及科研机构学者。

非遗记录项目名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彰显“专题+人物”的对象化形态，开宗明义即以具体的人作为抽象的专题概念的落脚点。

据悉，国家图书馆设计该项目实施规划时，邀请了从事非遗保护研究的专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涉及诸领域的专家、影视人类学家和文献档案学家共同提供智力支持，相关成果体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试行本）（下文简称为《操作指南》）<sup>[5]</sup>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十讲》（下文简称为《十讲》）<sup>[6]</sup>。《十讲》是国家图书馆组织相关讲座发言稿的汇编，《操作指南》是指导子项目实施的规范文本。

《操作指南》对记录的内容作了分类，即口述、传承教学和项目实践三类，主体为传承人。口述片为访谈场景的音像记录与剪辑呈现，访谈人为子项目学术专员，访谈对象为传承人本人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人，访谈主题为传承人的人生史。传承教学片为传承人传授非遗知识场景的音像记录与剪辑呈现。项目实践片为传承人实践非遗知识场景的音像记录与剪辑呈现。除了口述片、传承教学片和项目实践片，还有一种类型，即综述片，基于访谈、传承教学、项目实践等场

景的音像记录素材来综合呈现传承人。

从音像志视角看，非遗记录已初步建构出非遗传承人音像志的框架：以拍摄素材为地基，以口述片、传承教学片和项目实践片为基础，以综述片为地上建筑物。鉴于非遗传承人是一个外部赋予主体的抽象概念，为了更充分地呈现人，非遗传承人音像志的地基和基础宜适当拓展生活世界的面。譬如，增加一个“其他生活片”，呈现传承人生活世界里与非遗事象并不紧密的内容，即超出口述、传承教学和项目实践范围的生活内容。地基和基础充实了，综述片这地上建筑物就有了更真、更善、更美的可能。

摄录机记录场景，尽管拍摄者有一定程度发挥的能动性空间，并在纪录片学术史上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技术，诸如构图、光影、景别、机位、蒙太奇等等，但是，摄录机记录场景的本质是客观的，音像记录的成果内容，即作为剪辑素材的音像场景内容，取决于场景内容。在摄录机在场的条件下，场景内容的实质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体现为发生在他们主观性层面的生活世界的相遇与相处。

非遗记录项目属团队工作，据《操作指南》角色规定，设有项目负责人、学术专员、导演、摄像、录音、后期、翻译、其他业务人员等角色。这就意味着，所有音像记录成果，包括口述片、传承教学片、项目实践片和综述片，其内容实质是项目团队与传承人生活世界的相遇与相处，其内容如何，取决于双方各自的生活世界及其在彼此相遇与相处过程中的拓展。考量非遗传承人音像志的价值，在音像志主角既定的前提下，音像志项目团队是决定性因素。若音像志项目团队对音像志主角生活世界具备充分的包容意愿、理解能力和长期相处的耐心，音像志的价值必高。若音像志项目团队与音像志主角生活世界相隔，音像志的价值必低。

丰富的志书文献是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人类文明重大历史成就之一。随着20世纪末数字音像技术出现革命性突破，高画质、高音质，便携、价廉的摄录一体机开始面市，作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一个基础领域，音像志的兴起与繁荣是必然的。

## [参考文献]

- [1] 郭净.民族调查与电影传统[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4(05);郭净.关于“民纪录片”几个问题的考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5(04).
- [2] 鲍江.你我田野:倾听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7.
- [3] 郭净等.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 [4]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节日影像志体例[EB/OL].2015-01-06.
- [5]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操作指南(试行本)[EB/OL].2016-07.<https://www.jinchutou.com/p-93299659.html>.
- [6]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十讲[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 参考影片:

杨光海《鄂伦春族》,1963《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1976《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1978。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节日影像志》子课题部分结项成果 2012-2018。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子项目部分验收成果 2017-2018。

Robert Flaherty: *Nanook of the North*. 1922.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udio-visual Chronicles — Comment on Three Relative Studies

BAO Ji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1)

**[Abstract]** Emerg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audio-visual technology and academic research started in the 20th century. Audio and video chronicle is the combination of audio and video records, a new text-based genre focusing on documenting real happening and completeness of its content. Theoretically speaking, any kind of chronicle may involve its audio and video records, such as local audio and video records, personal audio and video records and etc.. Since the setting up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country has carried out some large-scale projects including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Social and Historical Science Record", "National Festival Video Record" and Record on the Legacy of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o-visual chronicles, it is appropriate to classify it into the ethnic audio-visual chronicles and position it as the groundbreaking starting point of the national audio-visual record in China.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n appropriate conversion metho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wo aspects. In one aspect, the object can be audio-visual imag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obj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the ethnicity. The purpose of the ethnic audio-visual system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fundamental and concrete aspect of existence, or focusing on a specific person. The logic behind this is that as far as a clear record of an individual person is made, the commonality of an ethnic group represented by the person him or herself is captur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ethnic audio-visual chronicle i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audio-visual images of single person reco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o-visual records, records on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has formed up the preliminary audio-visual framework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holders. The study of the festival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bstract concept is the first step fulfilled by of the festival audio-video chronicles. In the second step,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way to explore and present the festival,

which requires suspense of phenomenology of all abstract concepts involved in the first step , and realizing objects suitable for audio video record of festivals and people experiencing the festivals. The third step is to remove the suspense of phenomenology and return to the first step , that is , to explore the concrete ways to embody the results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festivals under the premise that people experiencing festivals are regarded as the object of audio-visual record. Based on such numerous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s , this article builds upon the tradition on local “chronicles” , refers to German philosopher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s thought , and puts forward a theoretical outline of the “audio-visual chronicles”. This is expected to help expand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research and expression field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addressing audio-visual system.

[**Key words**]imaging; ethnic group; festival;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suspense of phenomenology

[责任编辑 边 笈]